

引入与再造: 经济理论 在中国的百年嬗变历程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自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来、或者自1902年严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已走过了百年的成长和发展历程。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始终以“引入”和“再造”作为主要线索,尽管在不同的阶段,中国经济理论的主要引入对象出现了从欧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到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主体的现代经济学的依次转变,但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始终具有“西学东渐”的显著特征。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以“全盘照搬”的方式来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在引入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再造、并使之更好地耦合中国的经济实践也是中国经济学科演变的重要特征。从广泛性引入到选择性引入、从被动式改造到主动式建构将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和转型的重要使命与基本途径。

关键词: 引入; 再造; 中国经济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56(2012)04-0005-10

一、引言

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端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在政治层面先后引发了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和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且在经济维度加速了西方经济理论的引入并深刻改变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轨迹。尽管在漫长的经济社会演化进程中,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诸多富有洞见的经济思想(胡寄窗,1998^[1],陈绍闻、叶世昌,1978^[2],赵靖,2002^[3]),这些经济思想中的某些部分甚至对西方经济理论和社会实践曾经产生过影响,例如:谈敏(1992)^[4]指出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具有受影响于中国古代思想的历史渊源,而李超民(2002)^[5]也细致探究过中国古代的“平糶”(常平仓)制度对美国农业调节实践的影响。但在整体上,古代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经济科学,中国经济学是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孙大权,2006)^[6]。特别是,以1902年严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为标志,中国才开始真正进入现代经济学从萌芽到成长的百年发展历程(林毅夫,2000^[7];张亚光、黄夏岚,2009^[8])。自此以后,中国经济学人置身于中国经济社会演进与变革的历史洪流之中,立足于实现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富民强的本质诉求,以“引入”和“再造”作为主线推动了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并在各个时段对中国经济实践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解释和引领作用。尽管在不同时期,外来经济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的影响程度存在着差异,但“引入”外来经济理论、并比照中国实践对这些理论进行“再造”的确是贯穿百年中国经济理论演变的基本线索。在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古典及新古典经济理论和中国本土经济思想呈现出在“竞争”中相互激荡、相互启发和相互融合的

特征,而不同经济理论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又以提高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的解释力以及对国际经济思想的贡献度作为最终落脚点。

二、中国经济理论嬗变:20世纪初至1949年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中国经济从此前占世界经济主导的位置开始了“断崖式”的下滑^①,而中国国门逐渐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制性”地打开,一批仁人志士也开始“睁眼看世界”以寻求中国救亡图存、繁荣富强的适宜路径和方案。在此背景下,域外的经济思潮、理论和学说开始大量进入中国,然而在晚清时期,这些经济理论是以“被动的”方式进入中国的,其集中的表征是:1860—1894年传教士在西方经济学说向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李浩、梁永康,2008)^[9],这些传教士(例如:郭实腊、丁韪良、艾约瑟、傅兰雅、李提摩太等)通过译著书刊、兴办学堂、开设课程等将一些资产阶级的近代经济理论传播到中国,并冲击着“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等中国传统封建经济思想。显而易见,在19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期的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对外部经济理论和学说的引入基本是被动的,难以自行选择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形在20世纪初期有了较为明显的改观,其重要的原因是: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渠道的日益增多,传教士丧失了在中外文化交流中主要媒介的地位,海外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逐渐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主体作用。换言之,在20世纪初期之后,中国对外部经济理论的引入和传播开始进入“主动”和可以自我选择的阶段。

在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经济学界对外部经济理论的引入主要是沿着两条主线展开的:一是以马寅初、刘大钧等留洋学者组成的“中国经济学社”,该学社在当时的中国经济学说和政策影响中处于主导者地位^②,其学者运用的分析工具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使用的概念工具是“欲望”、“效用”、“边际”、“弹性”、“均衡”、“供求”等;二是以孙冶方、薛暮桥等学者组成的“中国农村经济派”,该学派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推动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学者研究经济问题采用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使用的概念工具是“剥削”、“商品价值形态”、“剩余价值”、“生产关系”、“封建”等(孙大权,2006)^[6]。容易发现,以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作为学习对象的“中国经济学社”和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学习对象的“中国农村经济派”,在中国应引入哪种外来理论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在政策主张等方面也各不相同,但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这些学派均认为不能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中给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最适方案,均试图通过引入外来理论来阐释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也均未立足于中国实践形成了一整套具有逻辑自洽性和系统性的中国经济学。

尽管引入外来经济理论是20世纪初至1949年中国经济理论嬗变的主要方式,但这并不排除个人物对国际经济理论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留学海外的张培刚先生,1945年张培刚在哈佛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成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③。同时,导源于中国经济现状与外部经济格局的差异性,中国经济学人也不是单纯以“全盘照搬”、“食洋不化”的方式来学习外来

^①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测算结果,1820年中国的GDP占世界GDP的比重达到了32.9%,比西欧及其衍生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和还要高出近23%。但在此之后,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出现了急速的下滑。详见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②王亚南认为“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中心的那些英美派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大利学派,在民国经济讲坛和论坛上,在经济实践上,取得了指导的立案者的地位”。详见: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生活书店1947年版。

^③张培刚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Agriculture and Industrialization)获得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最佳论文奖和“威尔逊奖金”(David A. Wells Prize),被列为《哈佛经济丛书》第85卷,于194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1年该书被译成西班牙文在墨西哥出版,1969年英文本在美国出版,1984年被译为中文在中国出版。

理论,而是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对外来经济理论进行部分的本土化改造。以“中国经济学社”为例,该学社是以留美归国的经济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而英美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思想与实践的大本营,以发端于英美等经济体的经济理论作为蓝本很容易推崇自由市场经济,然而,到了1930年代,中国经济学社的主要成员大多数转而批判自由资本主义,极力提倡国家干预论,主张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孙大权,2006)^[6]。以经济体制的选择为例,如果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出现的两种基本经济体制的话,那么马寅初在1947年就指出“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同时并进。完全用英美的建设,是不合时代的需要;完全用苏俄式的建设,是非中国所能办得到的;故不得已采用混合制,但不是漫无计划的”(马寅初,1999)^[10]。这些政策主张是否耦合当时中国的经济实践尚可商榷,但从理论的嬗变基点来看,包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外部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均带有较为显著的“工具理性”特征,使理论服务于中国经济实践,甚至基于中国经济现状对外来理论进行局部改造,而不是比照理论对中国经济进行简单套用,更不是“削足适履”利用理论对实践进行错误指导,这体现了此阶段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以“经世济民”作为终极目标的可贵品质。

三、中国经济理论演进:1949—1978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引领广大民众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均具有里程碑或标志性意义。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这不仅是因为结束了长期的战争格局而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而且是因为面临着建国初期百废待兴的局面而亟待经济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发挥指导功能。如果说前者关系到经济理论“供给”的话,那么后者则关系到经济理论的“需求”,而“供给”和“需求”的对接则为此阶段经济理论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可能。然而,由于与封建社会以及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差异,因此新中国建立初期仍不可能从本土的思想中找寻经济实践发展的理论渊源,与20世纪初期到1949年相类似,1949—1978年的中国经济学科发展也具有极为显著的外部“引入”特征。不过,区别于此前以资产阶级近代经济学作为主要引入对象,由于新中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以及在国际事务中主要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往,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在百废待兴的现实条件下我国亟待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赶超目标,所有这些因素的相互叠加导致此阶段中国的经济理论主要引入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失去了对学术界和政策制定的主导性影响。

尽管可以按照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为标志将1949—1978年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相应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发展也可以划分为1949—1965年和1966—1978年两个时期^①,然而,就整体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引入和推广依然是迅速的、广泛的,赵晓雷(2001)^[11]将1949—1978年界定为中国现代经济理论初期发展阶段,并指出此阶段中国经济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从发展特征看,这一阶段的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线索。这条

^①程恩富、胡乐明(2009)指出:在中国,1949—1965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奠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适应学习、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的需求,马克思经典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主要著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1966—1978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僵化停滞阶段,此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出版工作被中断,马克思主义理论机构和研究队伍被破坏,正常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教学工作几乎完全停滞。详见:程恩富、胡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60年》《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9年第4期。

线索是承袭了‘五四’运动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研究,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并运用其原理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同时还表现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系统介绍以及对我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影响”。然而,这里的困难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最伟大的“病理学家”,他们所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概念,系统探究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生产、剩余价值流通和剩余价值分配规律,这与社会主义国家基于“建设”目标而寻求经济理论和学说有一定差异^①。因此,在推动中国本土经济发展的意义上,中国经济学界和政策制定者往往更多是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汲取思想养分。与之相对应的是,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经济学则逐渐失掉了在中国经济学学科中的主流地位,这既导源于在封闭经济背景下中国与西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学术交往被割裂,也导源于在思想领域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成为批判的对象。“这一时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研究大抵限于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介绍和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批判。这种介绍和批判在当时难以构成一条明晰的线索,对主流发展线索的影响也相当微弱”(赵晓雷,2001)^[11]。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作为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引入对象,对1949—1978年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乃至中国的经济实践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经济理论层面,从1955年创刊的《经济研究》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来看,此阶段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论题主要集中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按劳分配以及农业合作化等问题。此外,根据张卓元(2009)^[12],改革开放之前,计划—市场关系、所有制理论、企业体制与管理、农业经济理论、市场体系问题、产业结构理论、价格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财政理论、金融理论等均是当时中国经济学界探究的重要内容。就思想基点来看,中国经济学界所研讨的问题绝大多数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渊源,就方法论而言,此阶段中国经济学人主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演绎和定性分析方法展开学术研究。在社会实践层面,此阶段中国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引入,绝大多数是以解释和指导中国经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在这一时期,中国既是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教条理解以及对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盲目推崇,又是出于在国内资源和国际环境双重约束下快速发展经济社会的实践诉求,以致在经济实践中“选择”了资源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制安排中的公有制以及分配制度中的按劳分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在短期内通过国家形成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但同时也可能因为信息处理以及激励设计等方面难题而导致经济运行低效率。以产业选择为例,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②,重工业优先发展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同时,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内外社会形势也迫使中国将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重大战略,但这种战略选择是与当时中国劳动密集、资本短缺的客观条件不相耦合的,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产业结构失衡以及资源配置低效等后果^③。

^①这里最明显的表征是,政治经济学通常具有两个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前者以马克思《资本论》作为基础,后者则以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作为蓝本。

^②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大体有三个基点: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贯穿其中的是斯大林定义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对此可参看:赵晓雷:《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③对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实现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因、机理和后果,可参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尽管学术界对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批评较多,但近期也有文献从“投资外部性”的角度重新反思了这种战略选择的利弊得失,对此可参看:姚洋、郑东雅:《重工业与经济发展:计划经济时代再考察》,《经济研究》2008年第4期。

在 1949—1978 年, 中国经济学主要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引入”, 在研究中部分研究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在“文本意义”上的解读, 以及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具有“普适价值”的论证。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中国经济理论在此阶段仍具有在引入中反思和改造的特征, 例如: 在此阶段, 我国经济学界曾围绕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的性质等主体展开过多次讨论, 这些讨论在有些层面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文本层面, 并带有对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主动回应和自觉探究性质。从理论影响来看, 此阶段中国经济学界对外来理论的本土化改造涌现了两个代表性成果: 一是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理论, 一是顾准和孙冶方提出社会主义价值规律和商品经济的适用性问题。以后者为例, 1949—1978 年, 我国经济学界深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 普遍认为在有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是存在价值规律的, 在不存在商品和商品生产的地方则不存在价值规律, 价值、利润、企业管理和价值规律在某种程度上自然也就成为当时理论研究的“禁区”。在此背景下, 顾准和孙冶方等经济学家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进行了回应^①, 孙冶方刊发于《经济研究》1956 年第 6 期的文章《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以及顾准刊发于《经济研究》1957 年第 3 期的文章《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均指出: 不论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阶段或是初级阶段, 价值规律将始终存在着并且作用着, 在不同时期所不同的只是价值规律作用的方式, 而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在此之后, 孙冶方即使身处牢狱也在思考《社会主义经济论》这个主题, 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学人“不唯上、不唯书”以及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宝贵精神。

四、中国经济理论发展: 1978 年至今

1978 年 12 月 18—22 日,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举行, 全会作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 以此次会议为标志, 中国开始从计划经济时期步入市场化改革时期, 从封闭经济阶段进入对外开放阶段。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 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 在人类经济发展史上创造了“中国的奇迹”^②, 从 GDP 总量、对外贸易额、吸引外资额和外汇储备额等经济指标来看, 中国已经成为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经济大国。在经济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 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也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春天”, 特别是, 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也取得了长足进展, 经济学已经成为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中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显学”, 经济学研究日益表现出范式的国际化和问题的本土化特征。这种格局不仅得惠于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导致经济学界与外部的交流日趋活跃, 而且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①根据罗银胜(1999): 触动顾准探究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问题, 是他受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报告的启发以及对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深刻反思。1956 年上半年, 顾准已经认真通读了《资本论》, 并向孙冶方指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7 篇的下述一段引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废止以后, 但社会化的生产维持下去, 价值规律就仍然在这个意义上有支配作用: 劳动时间的调节和社会劳动在不同各类生产间的分配, 最后和这种事项有关的簿记, 会比以前任何时候变得重要”。此后, 顾准和孙冶方两人相互启发, 先后发表了著名的《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及《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篇文章, 可见, 顾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考确实较早。详见: 罗银胜《顾准: 民主与“终极目的”》,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近期, 国内外学术界正在激烈讨论“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中国模式”甚至“中国震撼”, 尽管不同学者和机构对“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以及“中国模式”的内涵如何界定存在着认识分歧, 但所有此类讨论均不否认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确实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在某种意义上,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正是“中国模式”能够成为一个全球性论题的前置性条件。对此可参看: 黄平、崔之元:《中国与全球化: 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张维为:《中国震撼: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等。

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推动力”和“试金石”。

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理论仍以外部引入作为关键词,然而与此前的格局相区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仍得到宣传、研究和重新阐释,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则被中国学术界深入反思和批判(樊纲,1995)^[13]。与此同时,导源于 1890 年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所开创的微观经济学、1936 年凯恩斯《通论》所开创的宏观经济学,以及 1948 年萨缪尔森在《经济学》中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综合,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理论演进中的主流学派,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本内容的现代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引入的主要内容^①。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相比,现代经济学往往具有探究资源配置效率以及便于采用数理工具等“比较优势”,同时,现代经济学的若干理论对中国经济实践也具有更为显著的解释力,例如: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等等。在此背景下,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现代经济学甚至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学的主流研究范式。例如:王长刚(2006)^[14]根据《经济研究》中各类文章的内容、研究方法、数量等变化将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过程分为四个阶段:1979—1986 年为初步介绍和准备阶段;1987—1991 年为扎根阶段;1992—1998 年为新的研究范式和学术规范的确立时期,现代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主流研究范式;1999 年之后为学术规范确立后的继续发展阶段,国内经济学研究表现出与国际经济学界相同的特征,但在研究水平方面仍存在不少差距。上述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扩展格局能够得到其他类似研究的支持(夏业良、王欣,2000^[15];成九雁、秦建华,2005^[16])。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推动中的引入表现在诸多层面:就研究主题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集中探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价值规律、所有制、剩余价值等问题逐渐被淡化,而在西方经济学体系内处于重要位置的供求、价格、就业、货币、均衡、产权、成本收益、交易成本、制度变迁、企业治理等问题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研究的重要内容。就研究方法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侧重于从逻辑推演和思辨中思考问题,而现代经济学则强调通过模型设立来得出经济现实的“简约形态”,并利用计量分析工具对研究假说进行实证研究,以此增强理论的说理力和可信性。由于现代经济学具有研究范式国际化以及对特定经济问题的解释优势,因此,以新古典经济学所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理论中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明显态势,不仅如此,现代经济学所推演的诸多理论见解也成为中国制定经济政策的思想渊源。例如:现代经济学强调市场具有处理信息、产生激励和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重要基础;同时,现代经济学认为产权清晰对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决策具有关键性作用,这也成为后续中国推进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以及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理论来源。

尽管改革开放之后,现代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引入的主要内容,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处于停滞或倒退阶段。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早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多个国家开始实施市场化改革,人们对“苏联范式”内在弊端的反思开始走向深入和全面。但与中国在转轨过程中经济问题的复杂性相适应,经济研究

^①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在学术界也存在不同看法,例如:有学者从研究内容的角度进行了界定,张卓元(2009)认为“现代经济学一般指西方经济学,包括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其他一些应用经济学等,他们以成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详见:张卓元《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经济研究进展及经济学方法革新》,《光明日报》2009 年 8 月 13 日),但也有学者从研究范式的角度进行了界定,田国强(2005)认为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详见:田国强《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经济研究》2005 年第 2 期)。

中仍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再认识和重新阐释,这种再认识实质上是找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之间的“差异”,并基于中国的本土化和当代化实践来重新挖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力。程恩富、胡乐明(2009)认为1978—1992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复兴发展阶段,而1993年至今则是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和创新阶段^[17]。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呈现出停滞和衰退态势,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意识形态中居于指导地位,更在于中国在体制转型背景下所呈现的经济问题具有复杂性特征,而发端于西方发达经济体的现代经济学难以解释中国本土化的“全部图景”,甚至现代经济学内部也出现了不断变革和演进的态势。在此背景下,现代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的相互借鉴和补充,对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无疑是具有价值的。事实上,20世纪90年代,在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方兴未艾之际,一些学者对当时国内经济学界表现出的“全盘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趋势提出了异议,并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争论(崔之元,1995^[18];何炼成、丁文峰,1997^[19];刘诗白,1997^[20]),迄今为止,关于现代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仍成为理论研究中存在认识分歧的重要论题^①。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学界对现代经济学的强力引进和推广以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新阐释,就根本目标而言均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带有非常明显的“中国本土问题”导向特征,尽管研究者使用的分析范式和工具可能存在差异,但都以解答中国当下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作为主要目标。考虑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所具有的体制转轨、结构转化、大国经济、全球背景等阶段性特征,从而导致中国经济具有区别于其他经济体的“异质性”特征,由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着本土化和当代化的使命,而脱胎于西方发达经济背景的现代经济学也具有“中国化再造”的内在需要,照搬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均难以对中国的经济实践提供有力的解释。正是基于此,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中国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此相适应,指导中国建设事业的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经济层面,有诸多的研究试图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特征,例如:逢锦聚(2009)^[21]从10个方面概括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基本内容:关于改革方向、目标和道路的理论;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微观经济理论;经济发展理论;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2008)^[22]则从9个方面归纳和总结了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即改革的理论指导:注重发挥理论创新的先导作用;改革的性质:将第二次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相统一;改革的方向: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改革的方式:以渐进式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视发展为改革的目标;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以稳定作改革的保证;改革与开放的关系:注重市场化与国际化之间的相互推动;改革的协调配套:推进全方位改革;改革的推动力量,注重发挥基层与领导层的合力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高速增长的特征性事实、国际社会对“范式转化”关注以及中国国内的“长期发展”需求,共同导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广泛讨论的议题,而与这种讨论紧密相关的是究竟是否存在迥异于现代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经济学”。然

^①尽管有许多学者强调中国经济学研究应该遵循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国经济学必须西方化和国际化,但也有学者对这种看法提出了不同看法,例如:吴敬琏(2009)基于对中国转型时期利益格局调整的实践观察,强调“我们仍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详见吴敬琏:《我们仍处在政治经济学时代》,《北京日报》2009年5月4日。

而,在实践层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总量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伴生着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这迫使中国未来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而在理论研究层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中国经济学”尚处在探索阶段,距离最终定型和范式形成仍存在着很大差距(高帆,2010)^[23]。显然,只有经过实践检验和理论提炼之后的经济发展方式才具有推广和普及价值,在此基础上才有区别于其他经济学流派的“中国经济学”。实践中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会直接影响到理论构建,迄今为止,社会各界围绕“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和外延尚未形成共识,自然地,还不存在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从研究起点来看,人们均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态势,同时这种增长态势是与经济发展方式选择紧密相关的。然而,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中国经济学”的实质指向来看,不同研究者的侧重点往往存在较大差异,例如:郑永年(2009)^[24]指出“从经济上看,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这里使用的‘混合’这个概念和人民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是指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这里使用的概念范围要比所有权广,包括很多方面,在所有权之外,混合模式也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平衡等等”。程恩富、王中保(2009)^[25]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概括为:公有主导型的多种类产权结构;劳动主导型的多要素分配制度;国家主导型的多结构市场制度和自力主导型的多方位开放制度。张宇(2009)^[26]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就是与中国的国情相适应,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实现市场化、全球化和工业化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体制基础,以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的的经济模式”。尽管当前人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经济学”的认识仍存在分歧,但这些体现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出现了从外部引入向本土再造的自觉转换,在借用外来理论来阐释中国本土问题的层面上,无论是引入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找到交叉点和对话平台的。

上述梳理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经济研究事实上面临着两大使命:一是外来理论(无论是现代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问题;二是中国经济实践的经验的、理论化进而对国际经济理论的贡献度增强问题。尽管从20世纪初期开始,“引入”和“再造”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且“引入”的程度远大于“再造”的程度,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经济实践以及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水平的逐步提升,很可能促使中国经济理论建构的重心从“引入”转向“再造”,尽管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且面临着诸多值得破解的难题。例如:顾海良(2011)^[27]强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关系,表现在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用以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实际问题。……二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即把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经验中得出的新思想、新理论将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化,形成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的内涵和新的形式。但困难在于,在通常情况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领域,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是中国社会和实践的特殊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研究领域中,人们一般注重的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只有将这两个研究领域综合成一个研究领域,才有可能深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这两个主题的认识(俞吾金,2009)^[28]。作为对上述难题的一个回应,程恩富、何干强(2009)^[29]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是如何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现代化或现代转型,这种转型的基本思维方法和

学术原则被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即便如此,考虑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存在着差异,且世界和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均具有动态特征,因此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以及综合创新仍面临理论和实践中的双重挑战^①。

五、余 论

自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以来、或者自 1902 年严复翻译并出版《国富论》以来,中国经济理论已经历了百年的成长和发展历程,以 1949 年新中国建立和 1978 年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战略为分界点,中国经济理论的嬗变和演化可以区分为 20 世纪初期到 1949 年、1949 年到 1978 年以及 1978 年迄今三个阶段。从这三个阶段来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始终是以“引入”和“再造”作为主要线索的,在不同的阶段,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引入对象经历了从欧美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再到以新古典综合派为核心的现代经济学的依次转变,不同阶段经济理论引入对象的转变与中国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也与国家行为对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模式设定以及中国经济实践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概言之,在百年演变历程中,中国经济学具有鲜明的“西学东渐”特征,中国本土的经济思想以及经济实践的经验总结尚未成为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并形成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的“有效替代”。尽管如此,中国经济学界并不是以“全盘照搬”的方式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经济学,在引入的基础上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使之更好地耦合中国经济实践同样也是中国经济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外来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和当代化不仅凸显了中国经济学研究具有“经世济民”的特征,而且暗示着中国经济理论具有成长和发展的内在品质。

进入 21 世纪之后,国内和国际经济格局均发生了深刻转变,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促使“中国模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热点话题,而发端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则为人们审视“华盛顿共识”以及现代经济学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理论的现代化就成为一个值得探究的主题,尽管在未来的较长时期内,“引入”和“再造”仍是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但从广泛性引入到选择性引入、从被动式改造到主动式建构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基本途径。宋承先(2001)^[30]强调“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中,一个学派或流派,一般在如下四个方面或其中的一两个方面,与前人或同时代其他流派相比较,有其独有的特点:一是理论的哲学基础,即世界观和方法论;二是分析论证问题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使用的分析工具;三是该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四是与其理论观点相应的政策主张”。按照这种标准,中国当前尚未形成迥异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经济学的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或“中国经济学”依然是一个正在被激烈争论的话题。然而,中国经济实践与西方发达经济体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提出时代均存在差别,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时代需要,同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学者与外部的学术交往正日趋频繁和广泛,且中国经济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已成为全球诸多学者和机构试图解析的对象,这在客观上为中国经济理论的创新和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格局下,中国经济理论很可能会在边际改进和不断累积的基础上,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更为有力的理论支持,同时也会为世界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更多的知识财富。

^① 胡寄窗、谈敏(1997)曾指出“在整个 1980 年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一直有各自的发展过程和发展线索,两者之间的分界清晰,而从 1990 年代后,两大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这种融合趋势具体表现为:一些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涉猎西方经济学,一些从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也感兴趣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但他们的种种努力仍未将这两大体系整合于统一框架之中。详见:胡寄窗、谈敏《新中国经济思想史纲要:1949—198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参考文献:

- [1]胡寄窗. 中国经济思想史[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1998.
- [2]陈绍闻,叶世昌. 中国经济思想简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8.
- [3]赵靖. 中国经济思想通史(修订本)[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 [4]谈敏.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 [5]李超民. 常平仓:美国制度中的中国思想[M].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2002.
- [6]孙大权. 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
- [7]林毅夫. 立足本土,遵循逻辑,培养出大师级的经济学家[J]. 经济科学, 2000, (3).
- [8]张亚光,黄夏岚. 改革开放的思想印记和学术见证[J]. 经济科学, 2009, (6).
- [9]李浩,梁永康. 外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经济思想的早期现代化[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8, (2).
- [10]马寅初. 马寅初全集(第12卷)[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11]赵晓雷. 中国现代经济理论:1949—2000[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12]张卓元. 中国经济学60年(1949—2009)[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13]樊纲. 苏联范式批判[J]. 经济研究, 1995, (10).
- [14]王长刚.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成长——基于《经济研究》(1979—2005)的考察[D].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
- [15]夏业良,王欣. 中国理论经济学50年发展轨迹的缩影:对《经济研究》刊登文章的统计分析与简略评论[J]. 经济研究, 2000, (5).
- [16]成九雁,秦建华.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轨迹——对《经济研究》1979—2004年刊登论文的统计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 (4).
- [17]程思富,胡乐明. 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60年[J]. 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 2009, (4).
- [18]崔之元. 西方经济理论的范式危机——与樊纲先生商榷[J]. 中国书评, 1995, (9).
- [19]何炼成,丁文峰. 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J]. 经济学动态, 1997, (7).
- [20]刘诗白. 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J]. 经济学家, 1997, (7).
- [21]逢锦聚. 改革开放与经济学理论创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J]. 经济学家, 2009, (2).
- [22]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课题组. 论中国特色经济体制改革道路[J]. 经济研究, 2008, (9).
- [23]高帆. 如何理性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J]. 学术研究, 2010, (8).
- [24]郑永年. 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J]. 中国社会科学, 2009, (5).
- [25]程思富,王中保. 论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J]. 前线, 2009, (10).
- [26]张宇. 中国模式的含义与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09, (1).
- [27]顾海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时代篇章——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1, (7).
- [28]俞吾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J]. 现代哲学, 2009, (1).
- [29]程思富,何干强. 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9, (4).
- [30]宋承先. 西方经济学名著提要[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收稿日期:2011—12—05 责任编辑:谭晓梅)